

两晋东宫述论

沈 刚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吉林长春 130012)

The basic frame of Donggong is a set of officer system. Its core is the successor to the throne. The staff of the successor is selected from the excellent persons. Choosing outstanding persons as friends, disposing arm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education, and economic ensuring are the important aspect to reinforcing the status of successor. In Two Jin dynasty, the junior brother can become the successor to the throne, but the reason is different. Establish the Donggong is order to reinforce the status of successor, but it 's contradicted to the thought because of the decaying imperial power. It also reflects the changing of political circumstance.

Key words: the Two Jin dynasty successor to the throne staff of Donggong

内容提要 东宫的基本架构是以皇储为核心建立的一套职官制度。作为储君的僚属,他们的人选来源也极一时之选。此外,为太子选择有才干的人作为宾友;给东宫配备相当数量的军队;重视东宫教育;在对东宫实行经济保障也是加强储君地位的重要方面。两晋还存在着皇太弟现象,但两晋发生的原因不尽相同。两晋东宫的设置是为了加强皇储地位,而在两晋皇权不甚强大的政治历史背景下,这种制度与设立的初衷相悖,这也是当时政治环境变化的真实反应。

关键词 两晋 储君 东宫职官

中图分类号 K206.4

文献标识码 A

所谓东宫是指以储君为中心的政治群体,它在秦汉以来皇帝制度确立时就已经出现,并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存在着。而两晋的东宫不但继承汉魏以来的传统,同时因为受到当时政局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又具有了一些新的特点。这些特色也反映了当时政治的一些情况。对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关注过,如刘驰先生对惠帝作为皇位继承人智力水平的判断等^[1]。我们在这些研究基础上,对两晋东宫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 储君的地位

储君是皇位的当然继承人,故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具体到两晋时期,主要体现在这样两方面:一是他可以代表皇帝行使一些礼仪方面的职能。如西晋太康三年,“鲁公贾充老病,上遣皇太子省视起居”^[2]。贾充作为重臣,皇帝派遣皇太子探视,在一定程度上就说明了他可以代

理皇帝的某些职责。另一方面,皇帝在突发情况下死去后,他就毫无疑问的成为最高统治者。皇帝在自然谢世后,皇太子登基,成为新的最高统治者,是一种当然的程序。然而皇帝在非正常死亡时,皇太子同样不需要任何中间环节就可以直接成为最高统治者。在东晋,孝武帝司马曜为宫女所缢杀,王国宝夜叩禁门,欲入为遗诏,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驾,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斩!”^[3]。王爽以皇太子未至作为借口,阻止了王国宝进宫为乱的企图,这就反映出皇太子拥有的仅次于皇帝的至高地位。

不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皇太子具有上述之地位。而且在与皇太子相关的礼仪活动方面,也同样有所体现。首先,在选立皇太子时,因袭汉魏以来的传统常常要大赦天下。如东晋明帝太宁三年“戊辰,立皇子衍为太子,大赦”^[4]。又如,永嘉五年七月,“王浚设坛告类,立皇太子,布告天下”^[5]。在

西晋末年如此混乱的情况下,王浚立皇太子还要举行告祭活动,只能说明可以此显示皇储地位的崇高。

其次,皇太子行冠礼,即成年礼时,还伴随着一系列的活动。据《晋书》卷三《武帝纪》记载,泰始“七年春正月丙午,皇太子冠,赐王公以下帛各有差”。在皇太子行成年礼时,赏赐群下,汉代就已存在。宣帝时“皇太子冠,皇太后赐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帛,人百匹,大夫人八十匹,夫人六十匹。又赐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为父后者爵一级”^[16]。与西晋相较,汉代还进行赐爵,这是因为自东汉后期以来,爵制已发生了变化,一般的民爵已轻滥、以至于消失使然。此外,皇太子行冠礼后还要谒拜太庙,上引惠帝在行完冠礼后,“丁未,见于太庙”^[17]。此时朝见始祖庙意义十分重大,它与皇帝行冠礼时的仪式是一样的。如简文帝“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见于太庙”^[18]。

此外,另一个例子也说明了皇储的崇高地位。东晋王朝建立后,在讨论为愍怀太子治丧的礼节时,王导认为“皇太子副贰宸极,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19]。从礼节上看,三朝之哀是皇帝治丧的标准,所谓“天子三朝举哀,群臣一哭而已”^[10]。所以在王导看来,因为皇太子地位的特殊,所以也应该享受到皇帝的殊荣。不但在礼仪方面,就是在现实政治运作过程中,也要切实保障皇储的地位。如司马炎为了保证惠帝能够顺利即位,“复用王佑之谋,以太子母弟柬、玮、允分镇要害。又恐杨氏之逼,复以佑为北军中侯,典禁兵。帝为皇孙适高选僚佐,以散骑常侍刘寔志行清素,命为广陵王傅”^[11]。这就是一个显证。当然,在专制集权的体制下,以上所说的这一切还是以保证皇帝的权威为前提的。如《世说·方正第五》注引刘谦之《晋纪》云:“敦欲废明帝,言于众曰:‘太子子道有亏,温司马昔在东宫悉其事。’”王敦为了论证废黜晋明帝的合理性,就以其不恪守子道,即对老皇帝的不敬为借口,这说明不论皇储的地位如何崇高,但都要置于皇帝之下。

二 东宫职官

东宫的基本架构是以皇储为核心建立的一套职官制度。这套制度在《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及相关的典志体史书中叙述甚详,同时在纪传中亦有补充,我们以两者为基础,将东宫的职官胪列如下。

1、保傅:所谓保傅就是指冠有师、傅、保头衔的太子东宫官署,他们是自先秦时期延续下

来的一类职官。这类职官在晋代虽然还存在着,但在数量上却处在变化之中。最初只有太傅和少傅,后来逐渐增加,至惠帝立愍怀太子时,“乃置六傅,三太、三少”^[12]。《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通传》中说的更为具体:“惠帝即位,立为皇太子。盛选德望以为师傅,以何劭为太师,王戎为太傅,杨济为太保,裴楷为少师,张华、和峤为少傅,和峤为少保。”六傅俱全的时间并不长,“自元康之后,诸傅或二或三,或四或六,及永康中复不置詹事也。自太安已来置詹事,终孝怀之世。渡江之后,有太傅少傅,不立师保”^[13]。保傅类职官虽然曾一度置有僚属,“并有功曹、主簿、五官”^[14],但在更多的情况,庶务由詹事及其僚属负责,而他们更多体现的是一种荣誉,以王公居之。即典籍所谓“武帝后以储副体尊,遂命诸公居之”,因而在很多情况下是兼任。如“李胤转太子少傅,领司隶校尉”^[15],即是。他们的职能是对皇储起到一种训导作用,所以皇帝也要礼遇之。晋武帝曾说:“夫崇敬师傅,所以尊道重教也。何言臣不臣乎!其令太子申拜礼。”^[16]因而,能够成为皇帝的师、傅,成为时人的一种荣耀,《书钞》引《晋书》云:“薛兼为太子少傅。自兼祖综、父莹、至兼,三世并傅东宫,谈者美之。”这就是一个例证。

2、詹事:詹事是自秦汉以后开始出现的一个职官,西晋自咸宁年间始置,中间曾废止过,惠帝元康元年,复置詹事,自此以后一直存在。詹事的主要职能是管理东宫的庶务,所谓“掌宫事”。

3、太子中庶子与太子舍人:这两个职官名称是自周秦以来出现的。典志体史书中对其职能没有更多的描述,但从纪传史料记载看,两晋时期他们在东宫的职责是起到一种言官的作用。如“(杜)预子锡,为愍怀太子舍人。屡直谏于太子,太子患之,置针著锡坐处毡内,锡坐,刺之血流”^[17]。是为舍人进谏太子。中庶子在两晋时期虽无明文说明,但《晋书》卷一《宣帝纪》提到司马懿在曹魏的情况事曾说:“魏国既建,迁太子中庶子。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与陈群、吴质、朱铄号曰‘四友’。”对太子而言,太子中庶子的作用大约也在于此吧。

4、卫率:掌东宫兵。在以上各种职官之外,尚有归属于少傅、詹事等掌管的各种属官,如功曹、主簿、五官、户曹、法曹、仓曹、贼曹、功曹、书佐、门下亭长、门下书佐、省事等,《晋书》的《职官志》、《通典》等已录之甚详,不赘述。

除了上述用以维持东宫正常运转的职官以

外,还有一些所谓“给事”,即一些不定期为东宫提供服务的官员。如惠帝时,“黄门董猛,素给事东宫,为寺人监”^[18];又“有卫督司马雅、常从督许超,皆尝给事东宫”^[19]。但对于这种情况,限于史料,更多的信息不得而知。

作为储君的僚属,他们的人选来源也极一时之选。西晋武帝时,“(任)恺忠贞局正,宜在东宫,使护太子”^[20]。又如东晋祖纳,“少持操行,以门寒品能,清言明理,文义可观,迁东宫舍人”^[21]。东晋皇帝的一道诏书也说:“东宫官属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悦典籍者。”^[22]故当时人称“皇太子宫文武之选,皆一时俊彦”^[23]。以王公重臣兼任东宫的师、傅等负有训导责任的职官亦可作如是观。从国家角度,对东宫的职官也十分重视,《晋书》卷四四《郑袤附子默传》载:武帝受禅,与太原郭弈俱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属宜称陪臣,默上言:“皇太子体皇极之尊,无私于天下。宫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国。”事遂施行。这也就是说,自西晋开国伊始,宫臣同朝臣的地位是平等,而高于普通藩国。

三 巩固储君地位的其它措施

选择合适的人选充实东宫,为东宫的僚属,固然是加强皇太子地位的最直接的制度保障,而下列诸项措施也不能忽视的一些方面。

首先为太子选择有才干的人作为宾友。这早在西晋就已经出现,如《晋书》卷三七《宗室传》:“元康初,愍怀太子在东宫,选大臣子弟有名称者以为宾友,(司马)略与华恒等并侍左右”。同样的例子还有华恒^[24]。宾友的来源为“大臣子弟有名称”者,这样做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提高皇储的从政能力。东晋的东宫同样也存在着这种情况,据《晋书》卷六《明帝纪》记载:明帝“立为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钦贤爱客,雅好文辞。当时名臣,自王导、庾亮、温峤、桓彝、阮放等,咸见亲待。尝论圣人真假之意,导等不能屈。又习武艺,善抚将士。于时东朝济济,远近属心焉”。从这些东宫宾客的来源看,比起西晋的大臣子弟,他们的地位更高。这固然有东晋时期门阀政治影响的因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通过将皇太子托付给这些世家大族,也可以稳固他的地位,以顺利继承皇位。

其次,给东宫配备了相当数量的军队。在西晋初年的两次政争中,均提及了东宫兵。在外戚贾、杨之争中,太傅主簿朱振说骏曰:“今内有变,其趣可知,必是阉竖为贾后设谋,不利于公。宜烧云龙门以胁之,索造事者首,开万春门,引东宫及外营兵拥皇太子入宫,取奸人,殿内震惧,必斩送之。不

然,无以免难。”^[25]东宫兵能成为政变所倚重的力量之一,说明还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又据《书钞》引王隐《晋书》云:刘卞为愍怀太子左卫率,知贾后必害太子,乃问张华。华曰:“君欲何如?”卞曰:“东宫隼戩如林。四率精兵万人。”刘卞更清楚的说出了东宫兵力的配备情况:拥有精兵万人,为四率所统领。所谓四率,按照《宋书·百官志》所言:“晋初曰中卫率,泰始分为左右,各领一军。惠帝时,愍怀太子在东宫,加置前后二率。”即前后左右四率。东宫兵应该终两晋一直存在,因为据《晋书》卷七五《阮湛传》:“安帝即位,国宝复事道子,进从祖弟绪为琅邪内史,亦以佞邪见知。道子复惑之,倚为心腹,并为时之所疾。国宝遂参管朝权,威震内外。迁尚书左仆射,领选,加后将军、丹杨尹,道子悉以东宫兵配之。”但这时东宫兵已经可以被权臣肆意分割赠予,这正是皇权式微的一种反映。

重视东宫教育也是巩固储君地位的一种方式。这可以从两个角度说明。其一,从侍讲东宫的人选看,他们是处于政治权力中心的人物。在西晋“散骑常侍贾谧侍讲东宫”^[26],而贾谧为外戚贾氏家族成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朝政。而东晋为适应门阀势力发展的局面,一些门阀家族成员成为侍讲之人。如王导之子“悦少侍讲东宫,历吴王友、中书侍郎,先卒,谧贞世子”^[27]。使用这些人作为侍讲人,使得太子能够和处于权力核心的人保持着联系,在维持其皇储地位方面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二,从其学习的内容看,也是以保证皇太子能够有足够行政能力为目标。据《文选·为贾谧作赠陆机》注引臧荣绪《晋书》:“泰始七年,皇太子冠,世祖以皇太子富于春秋,初命讲《孝经》于崇正殿。”《孝经》作为规范人伦关系的儒家经典,让皇太子学习是有着现实意义的。从另一方面,不适合皇太子学习的内容有些也被限制着,东晋就有这样一个例子。“帝以贺循行太子太傅,周玘为少傅,庾亮以中书郎侍讲东宫。帝好刑名家,以《韩非》书赐太子。庾亮谏曰:‘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纳之”^[28]。这说明,即使皇帝想以法家的思想灌输给皇太子,但在东晋门阀主导政治的局面下很难行得通。为了政局的稳定,让皇太子屏弃“刻薄伤化”的法家理念是有必要的。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对东宫所采取的各种措施,无不以指向巩固储君的地位为最终目的,通过皇位的顺利交接而在一个方面达到政局的稳定。此外,在经济上对东宫实行保障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据《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通传》:“东宫旧

制,月请钱五十万,备于众用。”

四 关于皇太弟问题

自汉魏以来,在没有特殊变故的情况下,皇位的继承一般采取父死子继的方式。但在两晋时期却存在过兄终弟及的形式^[29]。最早出现这种情况在八王之乱时期。《御览》百四十九引王隐《晋书》卷一云:“永兴元年,成都、河间王复废覃为清河王,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而不久以后,‘废皇太弟颖,立豫章王炽为皇太弟’^[30]。以皇太弟身份作为皇储,东宫的职官较太子变动不大,只不过在名称上做了一定的改变,一律由太子改称为太弟,如‘高密王泰为司空,以播为祭酒,累迁太弟中庶子’^[31]。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兄终弟及的形式能够在西晋出现呢?这一时期的政局所产生的影响自然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但另一种原因似乎也在起着作用,即司马氏在开国时期皇位继承的不确定性。在司马氏早期,齐王攸曾经一度是皇位的候选人,史籍称:“初,齐王攸有宠于文帝,每见攸,辄抚床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几为太子者数矣”^[32]。而司马炎确定继承人时,曾经考虑过让他继承皇位,但最后因为政争的缘故,还是以其子司马衷为皇帝。“及帝疾甚,朝野皆属意于攸。攸妃,贾充之长女也,河南尹夏侯和谓充曰:‘卿二婿,亲疏等耳。立人当立德。’充不答。攸素恶荀勖及左卫将军冯廙,倾谄,勖乃使廙说帝曰:‘陛下前日疾苦不愈,齐王为公卿百姓所归,太子虽欲高让,其得免乎?宜遣还藩,以安社稷。’帝阴纳之”^[33]。可见,在这个时候,无论立弟还是立子,在制度上并无多大的障碍^[34]。而八王之乱去此不远,所以以兄弟身份取得皇权有传统可循,因而在这一时期会出现皇太弟现象。

东晋皇位的继承情况比较混乱,兄终弟及的情况虽还时有发生,但以兄弟关系入主东宫而顺理成章即帝位的情况比较少见。而父子相传意识已经为大家的观念所认可,这与西晋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司马岳最终能够当上皇帝,更多的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另一个例子从一个侧面也能说明这一点:“简文帝无子,令善相者遍相宫人。时李太后给役宫中,不预焉,相者见之,谓此当生贵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孝武帝,及会稽王道子。”^[35]简文帝为了父死子继采取了种种方式,说明这种方式应该是皇位继承的一种固有模式。当然这种观念能否正常实行是另一回事情。

综上可知,东宫在两晋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东宫重新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皇储的

地位,保证皇位的顺利过渡,减少因为皇位继承而可能导致的动荡,从而在一个方面起到加强皇权的作用。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两晋国家才会在制度与非制度两个方面采取了诸多巩固储君地位的措施。然而在两晋皇权不甚强大的政治历史背景下,注定这种制度在本质会有一些变化,与设立的初衷相悖,西晋诸王以皇太弟的身份入主东宫、东晋门阀对东宫的控制都是其中的表现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东宫制度发展变化,是两晋政治变化的晴雨表。

[1] 刘弛:《晋惠帝白痴论——兼析其能继位的原因》,《朝土族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

[2] 《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纪三》武帝太康三年三月条。

[3]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晋纪三十》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九月条。

[4] 《资治通鉴》卷九十三《晋纪十五》明帝太宁三年三月条。

[5] 《资治通鉴》卷八十七《晋纪九》怀帝永嘉五年七月条。

[6] 《晋书》卷八《宣帝纪》。

[7] 《晋书》卷四《惠帝纪》。

[8] 《晋书》卷九《穆帝纪》。

[9][10][27] 《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11] 《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纪四》武帝太康十年十一月条。

[12][13][14]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

[15] 《晋书》卷八《宣帝纪》。

[16] 《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纪一》武帝泰始五年十二月条。

[17] 《晋书》卷八《宣帝纪》。

[18] 《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纪四》惠帝太康元年正月条。

[19] 《资治通鉴》卷八十三《晋纪五》惠帝永康元年三月条。

[20] 《晋书》卷四十五《王恺传》。

[21] 《御览》二百四十三引何法盛《晋中兴书》。

[22] 《晋书》卷九四《隐逸朱冲传》。

[23] 《晋书》卷九四《隐逸朱冲传》。

[24] 按:据《华表传》元康初,东宫建,恒以选为太子宾友,赐爵关内侯,食邑百户。

[25] 《资治通鉴》卷八十二《晋纪四》惠帝元康元年三月条。

[26] 《资治通鉴》卷八十三《晋纪四》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条。

[27] 《资治通鉴》卷九十《晋纪十二》元帝太兴元年三月条。

[29] 按:如汉代文帝即位即是,但这些即位基本都是属于临时决定,而两晋的皇太弟却是皇太子一样先占据东宫,然后由东宫过渡到皇帝。

[30] 《御览》卷一四九引孙盛《晋阳秋》。

[31] 《晋书》卷六〇《穆帝纪》。

[32][33] 《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武帝咸宁二年正月条。

[34] 《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武帝泰始十年七月条。

[35] 《晋书》卷九四《隐逸朱冲传》。